



三角公園

遇見東南亞：「新台灣之子」與素質地理

蔡晏霖(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版權所有

引言：從「台灣之子」到「新台灣之子」

台灣與東南亞的跨國婚姻於1990年間顯著成長，並於2000年達到了十萬之數，引起各界廣泛的重視。針對此現象，天下雜誌於2003年3月製作了一期專題，討論跨國婚姻的子女教養，並將此專刊題名為「新台灣之子」。¹「新台灣之子」這個詞顯然與較早前已廣為人知的「台灣之子」論述有語源上的關係，然而語義上指涉的對象卻不相及：媒體以「新台灣之子」泛指台籍男子與具有東南亞或中國籍女子通婚所生的台籍子女。而「台灣之子」則是指於2000年就任的中華民國第二任民選總統，陳水扁先生。

本文所關注的，即是「台灣之子」與「新台灣之子」論述之間這種看似同源卻意義殊異的關係。近年來台灣學界對於所謂「新移民」與「外籍新娘」等議題已有豐富的討論，並對於「新台灣之子」(尤其是他們的母親)的污名化與他者化做出重要的批判與反省。²筆者希望藉由此文參與此一努力，也希望把討論拉到一個目前較少為人觸及的面向。我的出發點是：如果台灣與東南亞的跨國婚姻並非近二十年才有的現象，那麼「新台灣之子」到底何「新」之有？換言之，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想像與歷史建構，而使得台灣與東南亞在此刻的相遇顯得如此之新？

在本文中，筆者將藉由「新台灣之子」與「台灣之子」論述的並置與對照來思考以上問題。我的基本論點是：「台灣之子」是一則勝利論述，而「新台灣之子」是一種危機論述。從「台灣之子」到「新台灣之子」的論述轉向，反映出的是台灣對其在新自由主義框架下國際地位變化的焦慮。換言之，「新台灣之子」的新，是「新台灣」的新。然而這個新台灣的建構，卻是奠基於一種我稱為**性別化的素質地理**的舊想像。此一想像以一種不對稱的文化與性別階序關係抹去了台灣與東南亞間長期而複雜的亞際交流史。而正是源於這種抽象單一旦不對稱的素質地理，「新台灣之子」與「台灣之子」的社會距離才會在台灣人的想像裡顯得如此遙遠，而「新台灣之子」的「新」也才顯得危機四伏。

閱讀「新台灣之子」

“美麗的福爾摩沙之島，住著一群人…他們為了這片土地，默默的付出，認真的打拼，這群人就是我們所尊稱的「台灣之子」。”³

以上這段節錄自GTV頻道「台灣之子」節目網站的引文，十分精準地捕捉了「台灣之子」論述的兩大中心元素：「台灣」與「打拼」。在2000年第二屆民選總統大選選戰中，扁陣營為陳水扁出版了一本自傳，其標題就叫「台灣之子」。順利當選後，陳更儼然成為「台灣之子」這個符旨 (signified) 的最佳符徵 (signifier)；的確，雖然在邏輯上「台灣之子」並不單指陳水扁一個人，然而在使用上「台灣之子」往往被等同於陳水扁 (以及經由他所認可的其他人)。⁴這當然不是因為台灣只有陳水扁一個人成功地向上流動，而是因為「台灣之子」本質上乃是一則國族寓言。換句話說，「台灣之子」論述所企圖讚頌與建構的，不只是「默默付出，認真打拼」的精神，而更是一個「愛拼才會贏」的台灣國族。形象本土、苦讀出身、從貧戶之子躍為總統的陳水扁，因而是「台灣」與「打拼」這兩大元素最佳的結合。陳水扁於焉成為「台灣之子」精神最完美的肉身證道 (embodiment)——陳水扁就是「台灣之子」。⁵而透過陳的證成，「台灣之子」論述所召喚的台灣國族，即是那個「成功走出二戰終結時的貧窮與落後、擠身亞洲四小龍之一、開創了傲人的經濟與民主奇蹟、並且 (順著這個論述的邏輯) 即將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的台灣。⁶「台灣之子」論述因而是一則勝利論述 (triumphant discourse)，是一種把台灣的主體位置建立在於其過往的向上流動力 (upward mobility)，並期許其據此繼續「向上提升」的論述。

相較而言，「新台灣之子」則是一則危機論述。而這種危機感的塑造，正是訴諸於一個在過去努力打拼，向上提升的台灣，如今所可能遭遇的反挫。當讀者翻開天下雜誌的「新台灣之子」專題，她/他首先讀到的即是如下充滿危機意識的刊頭語：

今天的台灣，每八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母親是外籍新娘或大陸新娘。這些新台灣之子或新台灣之女，將說著帶有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腔的國語或台語，帶來更多不同的母語和異國文化。他們和他們的母親正受著什麼樣的台灣待遇？他們又會為台灣社會帶來什麼衝擊？加上來台工作的外籍人士，白領和藍領的勞工，時時刻刻走在你我四周，已有五十五萬外來人口，早已超過四十三萬原住民的總和。全球化的大移民潮，在政府和人民的忽視下，已不知不覺地席捲台灣。台灣曾以能處理「物流、金流、資訊流」而屢創競爭優勢，面對這一波超強的「人流」，台灣將如何因應？⁷

天下雜誌把外籍人口的移入與台外通婚子女的增加置放於「全球化大移民潮」的脈絡裡。而「這一波超強的『人流』」⁸，就像天下於2005年報導的「少子化的人口海嘯」，都已在台灣人「毫無預警」⁹的狀況下「不知不覺地席捲台灣」¹⁰。儘管天下在專題中多處帶入「危機即轉機」這種看似開放中立的說法，但此說法卻毋寧預設了這波(以東南亞與中國籍女性為主的)移民潮是個台灣必須克服的外來「危機」。

<新台灣之子> 專題到底把這股移民潮視為什麼樣的危機呢？簡言之，台外通婚生子女與其外籍母親，是被視為一股對於**台灣國家競爭力**的負面威脅。在台灣，這樣的看法其實並不新鮮。數位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會先後以直接而醜陋的話語表達過類似看法，引起有識者一致的撻伐。¹¹筆者認為，天下雜誌「新台灣之子」論述最值得注意的，恰恰在於它以一種立意良善、看似極具階級關懷的論述，而達成相似的歧視效果。因此，儘管筆者十分肯定天下為外籍配偶去污名化所做的努力，¹²卻也必須進一步質疑其如下的論述策略：

台灣必須實際面對的另一個現象是，十餘年來與東南亞女子成婚的人，不少是社經地位低，地處偏僻，甚至是身心障礙。例如澎湖居民可支配所得是全國最低，新女性移民者所佔比例最高，達21%。加上多數外籍新娘在本國受教育的水準不高，又不懂中文，無法輔導下一代課業，影響他們上學、就業，很難如台灣一般人向上流動。「布衣可為卿相，木屋到白宮之路，對他們大概不太可能」…欠缺適當的輔導與豐富的教育資源，這些新移民的下一代，往往在起跑線上就不公平。未來他們在學校也易遭受排擠拒絕，容易成為中輟生，造成社會問題。¹³

相較於明顯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言論，這樣的「新台灣之子」論述顯然有力得多，也因而需要更細緻的檢視。筆者在此提出兩個觀察：第一，天下把「向上流動」視為是一種個人自我實現、提升(self-improvement)的普世價值，並且把育成此流動力的首要責任歸屬於家庭。除了前引文，這種看法在以下段落表現得更為清楚：

台灣的社會富裕了，卻有越來越多家庭失去教養功能，讓孩子陷入學習的邊緣。¹⁴

二、三十年前的台灣社會，普遍都很貧窮，那時很多鄉下小孩的父母親，也多數未接受過多少教育。但那時候的社會，家庭功能比今日完整，對小孩教育也十分重視，許多父母再窮，借錢也要讓小孩讀書上學，因此農村出博士的故事，十分普遍。但是今天，儘管平均國民所得增加到一萬三千多美金，但是貧富差距拉大，貧窮人口增加，許多家庭教養功能正在喪失中。¹⁵

換句話說，天下認為一個正常的家庭理所當然地應該透過文化與物質資本的提供，促成其子女的階級流動。而一旦台外通婚家庭無法為其子女養成這種能力時，即被理解為是一種由家庭匱缺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家庭本是私人領域，社會卻要一起付出代價」¹⁶；「本來是邊緣人，後來演變成邊緣家庭。最後就是社會問題」¹⁷)。這種公/私的分劃，由是將「陷在貧窮循環中」的責任再度回歸於個人與家庭，而非國家、社會，更非佔有資源分配優勢的既得利益社群。的確，在天下提出的解決方法裡，國家的責任往往徒限於父權式的「掌握」、「輔導」與「管理」，¹⁸而非透過稅收公平化等制度性變革，對於社會資源進行更合理、更公平的分配。¹⁹

第二，除了把「向上流動」視為一種私領域(個體與家庭)的自我實現，天下也將其視為台灣集體認同的核心。《新台灣之子》一書即多處將台灣描繪為一個(曾經)以「均富社會」為理想，²⁰以公平的教育機會與考試制度為傲，²¹以及一個充滿幹勁，「喜唱「愛拼才會贏」的年輕國度」：

經過了數百年的筲路藍縷，經營建設，台灣一直像是個充滿活力的青少年，性喜拼、衝、闖、鬥、快的青少年。²²

這樣的台灣，是一個成功地在戰後創造經濟與民主奇蹟，由動亂與落後躍升為開發中國家，再進步為已開發國家的台灣。²³而搭乘「台灣」這班列車，全體台灣人也得以一起奔馳在現代化與發展的大道上。換言之，《新台灣之子》裡所投射的台灣，正如我之前討論的「台灣之子」論述，是把台灣的主體位置建立在其(過往的)向上流動力。而儘管藍營傾向強調經濟奇蹟，綠營強調民主奇蹟，這樣的想像與回憶其實是超越藍綠的。

遺憾的是，這樣的想像固然美麗，卻患有嚴重的選擇性失憶：台灣曾有的經濟高成長，其實是跨國工業資本在其全球性擴張的過程中，與威權政體合作剝削台灣低廉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的所達成的。而所謂的民主化與現代化進程，至今仍常以原住、農工及其他弱勢群體的人權與生活權為代價。²⁴更關鍵的是，「新台灣之子」論述裡這種台灣集體認同的建構，是奠基在一個關於「新台灣之子」的「無」的想像上的。換句話說，「新台灣之子」論述以一群缺乏向上流動力的「新台灣之子」(包括台外通婚子女、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童等弱勢族群)，對照出一個以往總是向上流動的台灣人與台灣國族：

很難想像，台灣過去以機會平等享譽世界的國民教育，現在竟然出現貧富差距。²⁵

娶外籍配偶的家庭，多住在鄉間，學校教育資源原來就比都市差，父母社經地位也較低。在機會開放的國家，「布衣可為卿相，木屋可至白宮」。但未來台灣經濟成熟，向上流動機會不若民國六、七十年代，這些孩童需要政府撥款，特別輔導，否則可能終生陷在貧窮循環中，甚至代代相傳，打破台灣多年來追求均富社會的理想。²⁶

台灣過去最引以為傲的成就—教育機會均等促成社會流動，正逐漸褪色，三級貧戶之子晉身總統將成絕響。²⁷

以上的說法，強調的不是台外通婚子女的個體缺陷，而是他們在台灣所身處的競爭劣勢。天下擔心的是，由

於其父母在物質與文化資本上的匱乏，台外通婚子女容易「輸在起跑點上」，²⁸並因此「終生陷在貧窮循環中，甚至代代相傳」。²⁹對於天下來說，這樣的劣勢標誌著台外通婚子女的集體位置。因此，儘管天下曾對「台外通婚子女素質低落」的說法提出批評，³⁰但它無疑認為這些新台灣之子有相較於一般台灣人「向上流動力低落」的問題。換句話說，天下仍然是以一個相對性的置缺(lack)來泛論所有的台外通婚子女；無論是因為母親缺乏現代化育兒知識與華語能力等文化資本，或是因為父親家短少金錢地位等育兒資本，³¹這些台外通婚子女一律都被指認為是無法「如台灣一般人向上流動」³²的一群人。

而反觀從「三級貧戶之子晉身總統」的陳水扁，不正是天下一再強調的「布衣可為卿相，木屋到白宮」的最佳範例？原來，「新台灣之子」被認為最欠缺的，也正是陳以及其他台灣之子最引以為傲的自我與國族認同核心：向上流動力。而這也就是「新台灣之子」與「台灣之子」論述最關鍵的交錯點：如果台灣之子論述讚頌的是台灣與台灣人發展與向上流動力，這樣的能力(在天下眼裡)在台外通婚子女這些新台灣之子的身上卻不復存在了。「新台灣之子」反向証成的因而是一個階級化的，跨越藍綠的「台灣之子」認同，一個台外通婚子女在其中找不到位置的台灣認同。³³

然而「新台灣之子」所撐起的台灣認同，卻是一則危機認同。當跨國工業與金融資本自一九八零年代起漸漸略過台灣而流向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以追求更低廉的勞工與自然資源時，台灣就失去了之前造就長期高經濟發展的有利位置，儘管執政者不斷企圖以進一步犧牲農民、勞工和環境來「拚經濟」。換句話說，台灣所面臨的危機，是全球經濟分工板塊位移後資本繞道台灣的危機。在此過程中，台灣空有「向上提升」的欲望，卻痛苦地發現自己在全球經濟分工秩序中已經或將要「向下沈淪」。於是，天下所害怕會「陷在貧窮循環中」的，其實不只是台外通婚子女所代表的新台灣之子，也是一個新的台灣。「新台灣之子」的雙重語意因而饒富意義：它既可以被理解為「台灣的新子女」，也可以是「新台灣的子女」。此雙重性正反映了天下對於「新台灣之子」的矛盾態度：這些「新子女」既是一群應該被拉上來的我們，卻也是一群正在轉變台灣，並且把這個「新台灣」給拉下去的他者。

天下在「新台灣之子」論述上的矛盾，正呼應了Immanuel Wallerstein對於發展主義的評析。Wallerstein指出，發展主義的支持者強調其雙重目的：一是促進國境內的社會變革，拉近公民與民間的距離，使其趨於平等；二是促使經濟上的後進國趕上先進國，也由此拉近國與國間的距離。Wallerstein的批判強調，發展主義認為這兩重目的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兩者間不僅沒有正相關的必然，還常常互相鬥爭。其結果就是，多數國家常以犧牲前者的決策來成就後者。³⁴Wallerstein的分析進一步引發筆者的提問：如果天下在「新台灣之子」論述上的矛盾，正反映出發展主義在分配正義與經濟發展上難解的矛盾，為何在「新台灣之子」論述中此矛盾卻變成一個迫人的現實，而非其論述內在的矛盾？換言之，是什麼樣的文化元素與歷史建構，使天下雜誌得以輕易地將這些「新子女」又轉譯為一群把「新台灣」給拉下去的他者？是什麼因素使得台灣人，從官員、媒體到民眾，都認為台灣在此刻與東南亞的接觸是一個新的、危險的關係？而在構連這個特殊的關係時，我們所強調的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歷史，又遺忘了什麼歷史？

「歐美澳」，「台灣」，「東南亞」：性別化的素質地理

筆者認為，「新台灣之子」與新台灣想像的建構，是奠基於一種我稱為性別化的素質地理(gendered geography of quality)的想像。這種想像，簡言之，就是透過把「歐美澳」(有時加上日本與新加坡)、「台灣」、「東南亞」置放於一個單線而不同稱的文化與性別階序鏈所形成的一種「重北輕南、媚西鄙東」³⁵的世界觀。因此，儘管「新台灣之子」是指來自東南亞與大陸的外籍移民女性的子嗣，但是在天下「新台灣之子」的討論中，卻無處不是歐美澳的蹤影。「新台灣之子」專題將這些在西、在北的先進國移民政策呈現為台灣理應仿效與學習的對象，³⁶彷彿來自這些國家的政策，就是最適合台灣的移民政策，彷彿台灣只有透過採取這些來自高品質國度的高品質移民政策，才能解決其面臨的低品質移民潮危機：

擬議中的移民署，…只是將入出境管理局、警政署外事處、陸委會相關業務結合在一起，使外來移民不必跑多個單位辦理居留與歸化國籍事宜。「只有方便移民，卻沒有整套政策並設法提升移民水準，也沒有提升國家競爭力，」一位了解國外移民政策的人士說。

這裡的「國外」，指得當然不是東南亞。而這些水準尚待被提升的「移民」，也不會是來自歐美澳加。而除了成為台灣未來移民政策的範本，先進國的移民政策還可用來正當化歧視性的移民政策：

很多人都為東南亞籍配偶教育素質擔憂，因為攸關我國下一代人的教育品質。…「政府很難拒絕人民與外國人通婚自由，但政府至少能要求這些家人，語言上能溝通，而且讓有一技之長的家人優先進入，」《經濟學人》提到。

縱使標榜自由民主的美國，在外國人歸化成美國國民時，必須經過口試，能說寫基本英語，以及了解美國歷史地理常識，由移民官員隨機問答，最難的還會問到最先成立的美國十三州是哪些等歷史問題。³⁷

馬克思曾指出，人創造歷史，卻只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³⁸而我要說：台灣在二十世紀末遇見東南亞，卻也只是在一個特定的性別化素質地理想像中遇見東南亞。在這種想像中，東南亞從來不是一個與台灣平等的主體，而是一個在歐美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話語中落後於台灣、比台灣更底層的他者。或許可以說，「新台灣之子」專題其實是透過一個想像的歐美來觀看台灣以及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而正因為這一只帝國之眼已經深深內化於「新台灣之子」的討論中，因而連台灣要善待東南亞移工移民，也彷彿只是因為不願意在「外籍人士」眼中淪為「第三世界」的一員，而不是基於對東南亞移工移民之工作權的保障與人權的尊重：

台灣產業已國際化，現今人口也國際化，外籍勞工、外籍配偶所受待遇與政府的保障，都會成為國際焦點。印尼、越南新娘被凌虐、折磨時有所聞；本來只是來照顧老人的看護工，卻長時間照顧老小，家務一手包。「台灣對外籍勞工的態度，簡直如Banana Republic(通稱第三世界)，」一位經常來台灣的德國企業人士表示。³⁹

「新台灣之子」專題裡對於東南亞新移民的再現策略，更多處直接沿襲美式多元文化的想像與語彙。除了根據「Asian American」的概念創造出「亞洲台灣人」⁴⁰這種奇怪的稱呼(台灣難道不在亞洲?)，此專題的主引文「台灣變貌」也仿效美國時代週刊出版於1993年11月的專題「The New Face of America」，以相似的混種想像描繪出一張多元的「台灣臉譜」，並以美國的族裔文化想像來定義這些新移民能為台灣文化帶來的「貢獻」⁴¹：

來自東南亞的九萬三千位國際配偶(東南亞新娘八萬七千位，其餘為東南亞新郎)，將改變未來台灣人種。根據衛生署統計，去年每百個新生兒就有八個是由外籍婦女所生的混血兒。

繼四百年前，荷蘭人、漢人和原住民混血後，台灣已在悄悄進行第二次大混血，外籍通婚可能持續進行。未來，台灣臉譜可能急遽變化，有印尼人的褐色卷髮，菲律賓人的深黑眼睛、泰國人的褐色皮膚，代代混血下去。

「台灣已不是單一民族，而像美國的民族大熔爐，」一位文化工作者說：「我們必須學著如何彼此相處。」他們會為台灣文化加入新血。在歐美，移民會帶進新風俗、新食物、新想法，甚至給流行音樂增添新樂風。⁴²

「新台灣之子」透過一個想像的歐美來觀看東南亞，反應出台灣與東南亞雖然比鄰，卻有著遙遠的心理與認知距離。的確，在由美國所主導的冷戰知識生產框架裡，台灣所屬的「東亞」與「東南亞」分屬於不同的地理區域(world area)，並常由分屬於不同機構且少有對話的學者與官僚進行研究與決策。透過發展、市場、脫貧等概念的接合，此一知識脈絡把亞洲不同地區、種族、性別、階級位置的人在近三百年來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自由主義現代性、二戰與冷戰等等不同歷史進程相遇中所生發的多樣、異質的歷史經驗，先化約為由不同指數所代表的國家經濟表現與發展程度，再進一步簡化為「區域」性差異。⁴³經過這種簡化與抽象化的知識統整後，所有由東亞到東南亞的資本流動，都被認為是幫助當地經濟發展、由上(東亞)對下(東南亞)的開發與救濟。台灣自1994年開展的南進論述即將東南亞視為台灣資本拓展的邊疆(frontier)，把東南亞想像成一個充滿未開發資源與廉價女體的熱帶沃土與資本主義處女地，等待著被充滿活力的台灣資本男性主體剝削、觀看、消費。另一方面，所有由東南亞國家到台灣與東亞(新加坡)的人口北向流動，也都被化約成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爭取更好未來的一種向上流動。的確，在台灣的主流媒體中，東南亞國家的出現總是伴隨著禽流感、自然災害、排華暴動、政變、炸彈客、伊斯蘭分離主義等負面消息。媒體也總是慣常地將來自東南亞的女性移工與婚姻移民描繪為不是出賣愛情(或肉體)的壞女人就是逃離貧窮(或排華暴動或回教父權)的受害婦女。而這些東南亞女性(無論是「受害者」或是「拜金女」)北移的旅程，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向上流動」的旅程。弔詭的是，當學者們將東南亞往台灣的移民解釋為兩個區域間不均衡發展的自然與唯一結果時，這樣的論證其實與上述觀點裡的「向上流動」論沒有太大的差別：其結果都是以一種化約的經濟決定論，「壟斷了主體性」⁴⁴，從而忽略了主體的型塑與身體、社會、階級流動之間的關係其實永遠是更為複雜而不可預測的。

素質地理的知識霸權，除了壟斷我們對於東南亞移民(非)主體的想像，也消抹了台灣與東南亞間長期、複雜、多向的亞際交流史。⁴⁵比方說，每個台灣學生都曾在歷史課本中讀過的「抗日英雄」飛虎將軍劉有福，其實也是L?u V?nh Ph c，是個流動於中越台三地，終其一生不斷跨越政治認同與區域疆界的人物。⁴⁶再比如說，1950年代中葉，台灣共和國運動曾試圖在新近獨立的東南亞國家尋求外交上的認可，並在1955年於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尋求向國際發聲的空間。⁴⁷而在1970年代冷戰時期的美國軍事霸權下，更有許多台灣人前往菲律賓從事演藝工作，並成為當地人雇用的台籍女傭。⁴⁸這些歷史片段顯示，東南亞曾經是、也可以是台灣人獲得援助、吸取殖民鬥爭經驗、學習獨立運動策略、爭取國際認可、發展演藝事業，以及出賣勞力、「向上發展」的目的地。換句話說，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從來就是超越扁平而單一的素質地理想像的：台灣與東南亞之間，不是只有由南向北、由下向上的流動可能；而台灣與東南亞之間的流動曲線，也從不只是單向傾斜的，而更該是多線纏繞、合作、與相互啟發的。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單一民族，更不是在二十世紀末期才遇見東南亞。台灣與東南亞一直有許多精采的遭遇，我們只是得重新學習去看見它。台灣要學習的，因而不只是如何與東南亞「彼此相處」，而是以一種超越性別化素質地理的方式看待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而透過重新看見東南亞，台灣人也將會學習以超越新自由主義發展觀的框架來看待我們自己，以及我們與世界的關係。

注釋：

1. 天下雜誌出版社並於2004年將此專題內的四篇文章與其他相關報導結集成書，書名同為《新台灣之子》(以下簡稱《新》)，副標則為「未來台灣百年競爭力」。本文以下引註頁數均以此書為準，並附上引用文章之原發表日期、刊號、與作者。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專書所收錄的相關報導尚有針對原住民、偏遠地區學童、台裔之子等，因此在此書中「新台灣之子」之詞所指涉的對象比專題裡的更廣。筆者將在引用時註明此差異。【[回本文](#)】
2. 如《台灣東南亞學刊》於2006年4月針對台越跨國婚姻所出版的專刊，以及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叢刊；夏曉鵬，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3期，頁157-196；夏曉鵬，2000，〈資本國際化與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9期，頁45-92；王宏仁，2001，〈《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1期，頁99-127；Wang & Belanger, forthcoming, 「Materializing Differential Citizenship: Integration policies and social exclusion of immigrant spouses in Taiwan」, Citizenship Studies。【[回本文](#)】
3. 引自GTV電台「台灣之子」節目網站首頁：<http://www.gtv.com.tw/Program/S101120021207U/page.htm>【[回本文](#)】
4. 陳根據這樣的身分而得以與其他具有「台灣之子」精神的人互相勉勵(如：www.epochtimes.com/b5/1/5/3/n84118.htm)，或甚至把他的「台灣之子」封號送給來賓(如：www.epochtimes.com/b5/3/4/29/n306037.htm)【[回本文](#)】
5. 當然，陳與台灣之子之間緊密的對應關係在2004年以後已隨著陳與其家人涉及多起弊案官司而有鬆動。?【[回本文](#)】
6. 這段敘述出自筆者，而非引文。?【[回本文](#)】

7. 《新》p140。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編輯部。【[回本文](#)】
8. 同註7。【[回本文](#)】
9. 2005年11月01日第334期，楊艾俐。？【[回本文](#)】
10. 同註7。【[回本文](#)】
11. 近年的著例，包括教育部次長周燦德的「大陸和外籍配偶不要生這麼多」論(中國時報2005/07/07)，以及立委廖本煙的「越南新娘餘毒」論(聯合報2006/04/01)。【[回本文](#)】
12. 天下2003年專題中與刊名同題的〈新台灣之子〉一文，引用醫生、老師與社工人員等第一線「專家」的說法，指出這些台外通婚子女，相較於一般的台灣孩子，較有可能發生基因缺陷與發展遲緩等問題。這些專家並進一步認為，這些孩子的发展變異是與他們的外籍母親的行為模式有高度相關性的：因為這些來自東南亞的母親們較台籍母親少做產前檢查，並且缺乏養育子女的現代知識。見《新》P154-155。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楊艾俐。此文明顯地將台外通婚子女特殊化、問題化，並把其問題歸因於其外籍母親的智識不足，從而污名化了所有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然而十七個月以後，天下的另一篇文章卻已對此類報導提出了有力的批判。見《新》p161-163。原刊於2004年08月1日第304期，林照真。但此文未指出天下也曾是這種歧視性素質論述的推手之一。【[回本文](#)】
13. 《新》p144-145。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編輯部。【[回本文](#)】
14. 《新》p196。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楊瑪利、楊艾俐。【[回本文](#)】
15. 《新》p228-229。原刊於2004年05月17日第299期，楊瑪利。【[回本文](#)】
16. 同註13。【[回本文](#)】
17. 《新》p135。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楊艾俐。【[回本文](#)】
18. 《新》p147-148。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編輯部。【[回本文](#)】
19. 參見夏曉鵬在本專題中的文章。【[回本文](#)】
20. 同註13。【[回本文](#)】
21. 見註27。【[回本文](#)】
22. 《新》p44。原刊於1995年04月01日第167期，楊瑪利。【[回本文](#)】
23. 當天下看到了機會均等的狀況不再，其解釋卻是：因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已臻「成熟」，再也無法提供其人民「若民國六、七十年代」向上發展的機會(p158)。【[回本文](#)】
24. 晚近的著例即有罔顧邵族人權益的「伊達邵觀光文化園區BOT規劃案」與樂生院/新莊捷運機廠工程案。【[回本文](#)】
25. 《新》p172。原刊於2002年11月01日第261期，陳良榕。【[回本文](#)】
26. 《新》p154-155。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楊艾俐。【[回本文](#)】
27. P235。原刊於2004年05月17日第299期，周慧菁。【[回本文](#)】
28. 參註14。【[回本文](#)】
29. 同註13。【[回本文](#)】
30. 見註12。【[回本文](#)】
31. 此問題責任(liability)的分配則是基於一種僵固的性別化親職分工想像：因為父親本應出外賺錢，母親本應在家育兒，所以缺錢是父親的問題，缺文化是母親的問題。【[回本文](#)】
32. 同註14。【[回本文](#)】
33. 「向上流動力」在新台灣之子論述裡這種兼涵個人與集體意義的特質，呼應著Nikolas Rose所指出的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觀及其對於公民主體(citizen subject)的建構。Nikolas Rose 的研究顯示，當代公民主體與國家的關係已逐漸從一種被動的宰制關係成為自我規範，積極參與的關係。(Governing the Soul, 1989, NY: Routledge) 在這種框架之下，公民主體的個人目標與各種制度與機構的目標間有高度呼應的關係。Rose把這種關係稱為「遠距治理」“government at a distance”(Powers of Freedom, 1999, Cambridge/NY: Cambridge U.P.)。值得注意的是，Rose的研究脈絡是二戰後的歐美自由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與其公民主體之間的關係；然而在台灣的脈絡裡，更有意義的討論點卻可能是二戰後藉由冷戰局勢而躍居霸權位置的自由主義現代性(liberal modernity) (參見Robert Latham, The Liberal Moment, 1997, NY: Columbia U.P.)。此一秩序把國家分為已開發、發展中、未開發三大類，並把發展視為一種無止境、單向的向上進程。對於新自由主義政府管理的討論，參見嚴海蓉在本專題的文章。【[回本文](#)】
34. P115-6。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second edition, 2001, Phil: Temple University. 【[回本文](#)】
35. 這是王智明的修辭。【[回本文](#)】
36. 《新》p148。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編輯部。【[回本文](#)】
37. 《新》p136-7。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楊艾俐。【[回本文](#)】
38.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Napoleon. 【[回本文](#)】
39. 《新》p146。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編輯部。【[回本文](#)】
40. 《新》p158。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楊艾俐。【[回本文](#)】
41. 而正如美國主流文化對於少數族裔文化的看法：他們的貢獻多僅限於可輕易被觀光、欣賞、品嘗、消費的「風俗、食物、想法、音樂」，而不是語言、思想、知識、價值觀、宗教、人才、藝術、技術、創造力…等其他無限的可能。關於台灣去政治的多元文化論，見陳政亮，文化研究月報，2007/08/25。【[回本文](#)】
42. 《新》p142-3。原刊於2003年03月15日第271期，編輯部。【[回本文](#)】
43. 同樣的知識生產框架把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四個國家吹捧為「東亞」小龍與「東亞」經濟奇蹟，而把發生於1997年波及韓日港的經濟風暴稱為「東南亞」經濟危機。然而，「東亞」經濟奇蹟裡有來自東南亞的木材石油等自然資源與勞力代工，而「東南亞」經濟危機更與國際金融熱錢的投機性流動有關。【[回本文](#)】
44. 見嚴海蓉在本專題的文章。【[回本文](#)】
45. 或者說，對於亞際交流史的簡化與忽視，是單一而同質的性別素質地理得以成形的必要條件之一。【[回本文](#)】
46. Mok Mei Feng, “Outwards, Inwards, but not Upwards: Historiography of Liu Yung-F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nadian Conference on SEAsian Studies at Laval University, Quebec City, Quebec, 2007 Oct 19-21. 【[回本文](#)】
47. 《台灣共和國(上)(下)－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2000，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回本文](#)】
48. 感謝陳瓊琪的提醒與資訊。【[回本文](#)】

若欲訂閱，請註明姓名及電子郵件地址，寄至csa_tw@yahoo.com.tw